

中越边境越南籍散工 社会支持网络的讨论^{*}

——以广西C市越南籍家具工人为例

□陈劲波,郭帅旗

[摘要] 从中越边境的跨国劳务流动切入视角,基于田野调查,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对位于中越边境前沿的广西C市某家具工厂的越南籍家具工人进行研究,通过对其跨国和迁入地社会支持网络的时空剖析,逐步得出越南籍散工的形成起因于“空间的劳动分工”,从而为中国进行区域合作以及成为海洋国家走进文化南海提供借鉴。

[关键词] 中越边境;社会支持网络;越南籍家具工人;文化南海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4)02-0062-10

Discussion of the Social Supportive Network Among Vietnamese Casual Labour on China-Vietnam Border

——a Case Study of the Vietnamese Furniture
Labourer in C City of Guangxi

CHEN Jing-bo, GUO Shuai-qi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entry point of the trans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across China-Vietnam border,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Vietnamese labourers in a furniture factory of C City at the front border area by field work,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The analysis on the time and space of the social supportive network in their homeland and the migrated places gradually reaches a conclusion that the emergence of the Vietnamese casual labour is due to labour division of space. Such a conclusion helps China to conduct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realize the civilized South China Sea as a maritime nation.

Key Words: China-Vietnam border; social supportive network; the Vietnamese furniture labourer; civilized South China Sea

一、引言

在 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无论在一国之内或之外,来自不同文化区域人类的流动行为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尤其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跨过21世纪第一个十年,在互联网尤其是个

人通信技术几乎将所有世界上现代形式的国家和地区连接成一张“网”的时代里,反观由来已久的人类流动,无论是互联网时代之前还是当下,承载着不同文化元素的人类,流动并涵化着“他者”的文化,“文化人”体现出趋向全球化的变异。

* 基金项目:2011年广西“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特聘专家岗位资助;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1JJD850004);2012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研究中心资助项目(2012)。

社会网络是流动人口非常重要的依靠,如本文涉及之越南籍散工群体,其适应陌生环境的途径与中国庞大的异地务工群体一样,是基于其所属的社会网络。

首先以国内研究成果为例,在此进行比较,如张继焦对迁移者就业与创业的研究提出三种适应策略,进而结合中国国情和国外人类学家的网络分析提出从“差序格局”向网络分析的转变,^{[1](P64,66)}体现了社会网络支持流动人口“生根发芽”的效用;与之相反,由郭伟和在对转型中北京社区进行研究,其中展现了社区资源被特权性社会关系网控制,从而将北京本地部分下岗职工和外地自雇人员排斥在这个社会关系网之外,而这些被排斥群体的生活模式和生计对策,以及这一群体内部不同社会角色之间相互贬低和排斥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缺乏社会网络作用所导致的流动人口不能“安身立命”。^{[2](P128)}

流动的劳务群体属于社会网络中的一部分成员,所以,本文以社会网络切入,认为在针对劳工群体的研究范围中,社会网络这一概念的外延应放回社会支持的理论框架之中讨论,形成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框架。

社会支持理论在中国学界,作为一种物质上的实际支持和精神上的情感支持,起初多用于心理健康问题,如李强^[3],之后主要应用于养老问题、^[4]贫困家庭、^[5]留守儿童、^[6]以及失业性贫困人口等研究。^[7]最后也出现有关于社会支持与社会网络理论结合的研究,尤其是个人社会支持网的研究。^[8]

值得注意的是,当视角转向国际移民和跨国流动问题时,社会支持网络的形态便在不同的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形态的文化集丛中生长,并由不同文化的边界反衬而形塑出来。如王春光、Jean Philippe BEJA 认为群体的聚集和互助找到合理的谋生和发展手段是温州在法国的非精英移民融入社会的有效途径;^[9]吴晓萍、何彪指出以复杂的家族关系为主线的社会网络关系使美国苗族在美国得以立足发展;^[10]何亚平、骆克任通过出国前海外社会网络、异国生存支持网络以及回中国后与日本方面保持联系等维度对赴日返沪移民的社会网络进行调查,体现出后续迁移存在的潜在拉动。^[11]李志刚、薛德升、Michael Lyons、Alison Brown 通过对广州小北路西非族裔黑人聚居区进行跨国社会空间的分析,从族裔的经济行为和往来中提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发展。^[12]孙晓娥、边燕杰对留美科学家的国内参与及其社会网络进行强弱关系假设的再调查,提出基于沟通平台和信誉保证的信息互通支持留美科学家的国内参与、提供体制资源。^[13]韩冬临、崔大伟发现留日海归与日本存在多方面经济与文化的跨国支持。^[14]

本文以质性研究方法为主,针对中越边境越南籍散工群体的个案研究,并非旨在测量网络结构,而通过叙事的方式从细节上把握这一群体的社会联系。^[15]

二、研究样本及田野概况

基于 C 市越南籍家具工人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所一致的实际情况,这一群体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工厂周边,本研究通过进入家具工厂,与越南籍家具工人生活在一起,逐步进入越南籍家具工人的社会网络,并基于参与式观察的学术视角,通过对工作环境、居住环境、食品、公共物品的观察、劳动环境的测量以及通过深入访谈和个案分析的方法进行。调查的时间为:第一阶段,2012 年 4 月、2012 年 10 月;第二阶段,2013 年的 1 月、2013 年 10 月。第一阶段初步到家具厂与工人相识,重点对家具厂越南籍家具工人的工作、生活环境进行调查,第二阶段对重点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及观察。但由于越南籍家具工人活动范围有限,加之 C 市家具厂比较分散,相隔较远,并因红木家具制造的业内“规矩”,介于家具设计样本、原材料等“商业机密”,家具厂以及不同工厂的工人之间极少往来,所以本次研究仅限于 1 家家具厂,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地缘文化与社会文化的联系,本次调查选取的家具厂位于跨国民族相对集中的区域,以便近距离、深入观察越南籍家具工人的社会网络。

(一)样本及调查的主客观条件

本次研究基于上述调查地家具厂的特殊情况和同属散工的越南籍家具工人的“神秘性”,本次调查的样本总体 20 人,其中 4 人为中国人,其余 16 人为越南籍家具工人,其中男性 15 人,女性 1 人。

需要说明的是,越南籍家具工人与其从属的越南籍散工群体一样,表现出作为散工自由性强,流动性强,边境地域来去自如的特点。笔者住在家具厂里,与越南籍家具工人同吃、同住、同娱乐,细致的观察和频繁的交流,一方面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一流动性强的群体,另一方面获得丰富的田野调查的实地材料,所以不影响调查的全面性。

基于第一阶段的接洽和熟悉,在第二阶段重点调查中,关于田野调查时间的选择源于工厂的客观条件和越南籍家具工人的主观条件。客观条件 1 月份接近中越两国共同的传统节日——春节,此时越南籍工人准备回国过节,有利于调查工厂结发工资情况,而且春节假期前劳动强度相对松弛,有利于访谈时间的充分和日常交流的频繁;中国国庆节期间有利于观察工厂在“本国”节日中的表现。在越南籍工人主观条件方面,由于临近春节,由思乡的情绪而

给家人购置的礼物等情绪的表达方式也提供了更加富有人文色彩的情感细节,有利于更加充分反映越南籍家具工人在社会网络中的实践行为,中国国庆节期间有利于观察越南工人对这一“他国”节日的态度和活动。

(二)调查点家具厂概况

C市家具工厂绝大多数散布在周边村里,很分散而且隐蔽,都在田地或者村民住宅中间,在马路上不能直接发现。但笔者进入工厂周边时,还是听到了打磨机的声音,并不明显,除了声音,家具厂在外观上具有相似特征,其一远离大路与高低不平的小路相连,其二院子中堆有木材原料,其三由于财力相对富足,家具厂院内大多有与库房面积一样大的铁棚顶用于挡雨,其四工人居住地多为陈旧的老建筑。C市的家具工厂之间来往较少,相离较远,一般一个村两三个家具厂,因为家具款式和木材储存量是一种商业机密。就算老板相互之间很熟悉也很少互相走动,有亲戚关系的也不能拍照。

个案1:家具厂老板,46岁,湖南人。

据他介绍,C市家具厂的选址大多是顺着城市的扩建迁移的,之前家具厂在市区有很多,现在注重环保,市区不允许有工厂,因为会产生噪音、垃圾、木屑、粉尘的污染;还有地域限制,不能接近居民区影响市民休息,而且市区的租金很高,农村便宜得多;基础设施比如水、电、道路,这方面的条件影响比较大,农村相对方便一些;城市里经营的成本很高,而且租厂房不像居住租房,需要一定面积,最好是现成的厂房和院子;离城区远就不受城市面积扩张影响,有小路通向大路方便,而且在农村不用经常搬迁,这种长久性也得考虑;所以,现状就是集中在市郊的几个村里。

三、越南籍家具工人社会支持网络的空间性分析

C市的越南籍家具工人主要来自越南的北宁省、河内市、胡志明市、海防市。从宏观的地理分布来看,C市越南籍家具工人的来源多为越南的中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占越南国土主要部分,那么,在相对广大的范围内,越南籍家具工人是如何获得工作机会并汇聚于中国边境小城C市呢?迁入C市后其生活又怎样被支持的?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视角,这里将从围绕越南籍家具工人跨国流动的社会网络中社会支持的方面对其空间性进行分析。

(一)越南国内工作机会的获得

C市越南籍家具工人的工作机会一般由越南居住的中国雇主的亲朋、越南合作伙伴或者工厂内有

权威的越南师傅引进、介绍。从越南籍家具工人的工作动机来看,最主要的表现为对更高收入的追求,越南国内工作的木工每月工资平均1500~1800元,而且饮食不好,想吃好的还要工人自己掏钱;从技能水平来看,师傅与徒弟之间的技术差不多,好的师傅很少,徒弟经过努力练习很快就与其师傅水平相当。

个案2:阿东,男,43岁,越南北宁人,木工师傅;阿山,男,38岁,越南北宁人,木工小工。阿力,男,41岁,越南海防人,木工师傅;阿树,男,越南海防人,45岁,木工小工。

家具工厂内阿东是阿山的师傅,阿力是阿树的师傅。在C市的这个家具厂里,师傅每月2500元;阿树和阿山是小工,工资每月2000元;阿宁是中国人但也是小工,每月工资2000元。C市的家具厂一般比越南家具厂给工人的工资多,在越南师傅每月约1500元,小工最多每月1000元。

根据田野调查获取的材料,发现其具有亲缘主导的特点,以越南籍家具工人中心按照由亲到疏分为越南籍家具工人亲缘网络、中国雇主与在越南亲友的网络、中国雇主与越南籍合伙人互惠的三个层次展现越南籍家具工人在国内获得工作机会的社会网络。

越南籍家具工人的亲缘网络。C市越南籍家具工人多由家庭、乡亲、朋友介绍引进工厂。从越南籍家具工人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实践行为来看,首先由个别越南籍家具工人进入C市工作,之后熟悉了跨国流动的方式、中国C市方面接应人的情况、工厂的工作以及居住环境与收入的高低,加之越南籍散工流动的自由性以及频繁地返回越南国内过节等导致中国一侧的社会信息频繁和迅速地传向越南国内的家乡和社交圈子,返回中国后又会将越南国内相关的劳务信息传回中国,从而连接和填补中国和越南之间相关劳务信息的“结构洞”,这也增强了越南籍家具工人自身的社会资本,因为有的越南籍家具工人介绍亲友并且在中国接应,带到工作地,一方面成为到中国工作的越南籍家具工人的依靠,另一方面也由于为中国雇主带来优质的工人而提高自己的地位甚至是收入。

个案3:阮文山,男,越南海防人,木工师傅,50岁。由亲戚介绍到工厂做工,在家具厂居住、准备再做两年攒些钱就回越南。作为师傅,他在越南就会木工,很擅长挑选原料,老板去进原料的时候有时也会问他一些问题,其亲戚和中国雇主的中国朋友结婚了,加上他自称在海防还是出一些名的,所以一个月的工资比厂里的工人要高,但具体数额没有透露。老板有时也会请他去市内吃饭,请他介绍几个看得

上眼的越南工人到工厂来做工。

中国雇主与在越中国亲友的社会网络。C市家具工厂的中国雇主和其他中国的管理人员与在越南的中国亲友之间往来密切,加之广西C市与越南往来交通便捷,距离短,中国人的跨国往来也非常频繁,由于共同的情感和利益关联,以雇主为代表,其与生活在越南的中国亲友也进行木料的采购、价格比较等信息交换,尤其是其亲友会从越南介绍家具工人到家具厂“试工”,试工合格后便立即开始工作,中国雇主便获得了“价廉物美”的劳动力。并且,由于生活在越南的中国亲友与越南籍家具工人之间也相识并且建立互信,所以越南籍家具工人也会比较快速地获得安全感和与中国雇主之间的个人关系。

个案4:文叔,C市家具厂管理人员,52岁,广西C市本地人。

笔者问到如何招聘越南籍家具工人的时候,据文叔反映,主要是老板的朋友,有中国人有越南人,从越南介绍过来,有的是他们认识,也有那边也做家具厂的,觉得厂里有熟悉的木工师傅,师傅手里“有活的”,大家都是朋友,那边也帮忙联系木料,也有相互钱财上的借贷关系,我们需要木工师傅就跟他们说,他们就找木工师傅先到这里试工,我们觉得不错了就可以上岗了,也有越南工人自己带过来的,都是找亲戚,不过里面就有些混日子的。

中国雇主与越南籍合伙人的互惠。C市家具厂由于原材料、半成品和工人大多来自越南,所以有很多中国人与越南人合伙开办的家具厂,主要由中国合伙人出资,负责办理手续、寻找场地、销售,越南合伙人出少量资金,主要负责越南方面的招工、原材料采购,销售所得按照协议分成,一般出资多的中国合伙人获得分成多。但是,作为一种业缘主导的合作关系,由于利益的追逐,产生了利用招收不会木工技术的越南亲友,从而向越南亲友提成,亲友关系不好的便会解雇,并且在采购时故意抬高价格赚取实际差价被发现导致合作关系断裂。所以这种“合伙人”的方式导致越南籍家具工人在C市工作的动荡。经第一阶段观察,2012年4月来厂里有17个人,很多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10月份的时候在老板的门店里就安排6个人住宿,负责送货和组装家具。据第二阶段调查,在2012年8月份的时候,工人数量开始减少,不是因为资金问题,是因为偷懒的越南籍家具工人太多。

个案5:根据文叔介绍:“这帮工人十几个,因为他们都是亲戚,互相介绍来的,还分了三个小帮派,后来除了阿东全体工人都辞掉了,除了他,别的人都偷懒,磨洋工,还能吃能喝的。”在工厂老板和越南籍合伙人合作的时候,越南籍合伙人负责原料和在越

南国内招募越南籍工人,结果原料进价高,招募工人都是其亲戚,开始家具厂老板也不好意思反对,可由于中国老板投入大部分的钱,2012年上半年有30万白白浪费掉了,后来便贷款并将工厂全部买了下来,越南籍家具工人也都辞退了,老板说:“越南工人还是不缺的,要招越南那边很多介绍的”。

(二)迁入地的生存支持

快速落脚。笔者在与越南籍家具工人访谈中得知,在越南办理一天有效出入境许可证,来到中国便直接由越南亲友接到工厂落脚,出入境方式依然通过C市北仑河上的铁皮船摆渡。经越南工人反映,中国出入境通行证办理很快,盖个章不用半个小时就办完,但是体检、劳务登记、还有暂住证与劳务登记之间先后顺序搞不清楚,非常花时间,有些时候越南一侧体检交了钱不用体检,但是中国的各项手续都很严格,觉得到了中国便不能浪费时间,要赶紧住下才安全,赶紧做工算工钱。

个案6:笔者在与阿东的交谈中问到:“你来中国这边办理证件了吗?”阿东回答:哈哈,我开始来的时候怕出事,就办体检和劳务许可,在越南交钱就可以,体检不用亲自去的。中国很严格,而且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到底是先办理暂住证还是劳务许可,办暂住证的时候要我说明工作单位,我办劳务许可又要我出示外国人居留许可,我都不知道先办哪个,后来越南的老板,去年就是老板的合伙人,告诉我如果不惹事的话没人找我,不被警察看到就好,看到也没事,中国警察也不打人,就说来探亲的,这里有京族,跟越南人是一个民族的。

提供食宿。C市的家具厂都会包下家具工人的食宿,这家工厂不光包下一日三餐,还包办米酒、饮料、烟丝、茶叶等消费品,偶尔也会买上一次啤酒一起喝。不过,饭菜的供应以老板态度为准,这家工厂顿顿有鱼、肉、米酒,但大多数工厂很少吃肉喝酒。老板会越南语而且在越南有生活、打工经历,所以会给工人比较接近越南的舒适待遇。

饮食方面。在这家工厂,除提供的饭菜还有越南籍工人最爱的越南鱼露以外,越南籍家具工人也自己制作作料,由于越南籍家具工人自己做早餐,按照他们的习惯是喝白米粥,之后抽烟、喝茶,剩下的白米粥装到塑料罐子里封上,发酵之后在沉淀的米渣上面有白色透明的液体,味道是酸的,但没有白醋刺激,就当做是白米醋了。作为管理人员的文叔也对“发明”者表示赞许。

个案7:2013年1月18日早晨在市郊的菜市场。

文叔说:“工厂除了早餐都是我做,早餐工人自己做的,买点儿中午、晚上吃的。一天工人伙食每人

15 元的标准。平常我们吃得也蛮好的,别的不说,我这里吃饭是不凑合的。”笔者看到文叔买了海鱼、两挂生猪肉、一块生猪肝、一棵白菜和一些芹菜,然后又买了一些辣椒之后把这些菜放进摩托座位下面的斗里,便转身进了一个食杂店,要了一箱漓泉啤酒放在摩托车脚踏的地方,又拎了一瓶玻璃罐的米酒,因泡了草药所以酒水是红色的。笔者坐在摩托车后座,抱着米酒,文叔用双脚夹着啤酒箱,踩着踏板便开摩托车回工厂了。

住宿方面。越南籍家具工人在厂房后边的平房居住,每个房间 2 个人,去年人多的时候一个房间 4 个人。摆放物品很简单,都是少量的洗漱用品、鞋子以及行李箱,穿过的衣服散放在行李箱上面和床上,每人一张单人床,蚊帐已经发黄。据笔者了解到,越南籍家具工人来中国的时候只携带简单的物品,没有带衣服、被褥等厚重或蓬松的物品,可谓“轻装上阵”,因为中国 C 市这边同样工作的亲友以及工厂雇主会提供衣物以及牙膏、牙刷、肥皂、洗衣粉、暖瓶等生活用品,体现出社会网络支持越南籍家具工人的生活。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如衣物、被褥等用品都是旧的,是之前的工人用过或者由雇主从亲友中收集后洗净再使用的。

四、越南籍家具工人社会支持网络的时间性分析

随着越南籍家具工人在 C 市工作、居留时间的增加,其与外界的交往理应增多和扩大,但是,由于家具厂既作为越南籍家具工人工作场所又作为其生活场所,所以这种封闭性和稳定性却也限制了越南籍家具工人对外交流,令这一群体显示出“神秘性”。

个案 8: 据笔者观察,工作时,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活,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分工,有的抛光木料,有的裁出形状,有的量尺寸,有的进行雕刻,有的进行打磨,有的在上漆,有的在搬运家具,还有一位越南中年妇女在收拾厨房,估计工人也刚吃过早饭。工厂里有成品家具,有散的木头,厂内木屑弥漫在空气中,越南工人在厂内工作的戴着口罩,天气挺热的,满头的汗水,看起来很辛苦。经测量工作时车间内的分贝,高的时候达到 83 分贝,低的也有 60 分贝,通常处于 80 和 70 分贝的区间。噪音还是比较大的,大型切割、钻孔、打磨的机器在质地很硬的木料上摩擦出很大的噪音,如分贝表显示相当于繁忙的街道、交通环境或者手机铃声、闹钟不停地响。

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工作噪音中,可以体会到时间观念麻木,加之工厂提供的生活消费品与越南是同样的,导致在物的体验上也没有大的改变,所以就

越南籍家具工人的生活、劳动作息而言,其时间上的习惯仍稳固在与过去相似从而保存得比较完整,自身文化的变化也较少。这便导致这一群体的社会资本积累的“意向”只能在工厂内部以及同胞间完成实践,从而这一群体的社会资本并没有进一步增长,原有的社会关系结构并没有进一步变化,产生了类似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提出的内卷化(Involution)效应。^[16] 本文以下将按照时间积累过程 C 市中越南籍家具工人群体支持网络形成以及结果进行描述和分析。

(一) 单调的生活节奏

工作间歇。与当下媒体报道如“富士康”和广东的纺织工人工作间歇少、持续机械工作、强度大的情况不同,C 市这家家具厂的老板和管理人员由于对越南非常熟悉,尊重越南籍家具工人在越南养成的工作习惯,越南籍家具工人想休息的时候就会到离车间大门近的地方,坐在没有销售的靠椅和茶几上喝茶、抽烟、聊天,持续 10 分钟,有时完成订单时间紧也会自觉休息 5 分钟,一般上午休息两次,第一次 9 点半左右,第二次 10 点半左右,下午休息一次,大约在 4 点半左右。而这简简单单的工作间歇,除表现出越南籍家具工人得到的尊重和这家工厂人性化的管理方式以外,也可从中发现越南籍散工在工作间歇的时候,聚在一起喝茶、抽烟,相互聊天、开玩笑,通过这一表面上平常的行为进行工作以外的社会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家都坐下一起,相互帮助泡茶、点烟、共用水烟筒,这时虽看不出家具工人内部的等级,但仍保持一个“小团体”坐在一起的方式。这家工厂不按照流水线的方式生产,管理人员会观察,并根据这种亲疏远近的关系,安排工人的工作位置和当天的任务,以保持工人间的互助和协调。

个案 9: 在 2013 年 1 月 19 日的调查中,笔者注意到,晚饭做了三条大鱼,阿力和阿树吃一条,阿山和阿东吃一条,第三条留给中国工人阿宁和笔者。吃饭的时候,每一条鱼都是平均分吃的,且吃一条鱼的连鱼刺也吐在同一个口碟里。

业余生活。家具厂里宿舍的娱乐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除了不能连接互联网以外,卫星电视、DVD 播放机、几十张中国、美国知名电影的光盘和越南流行歌曲的光盘也堆在电视柜里面,象棋、扑克、中文漫画书、还发现了调查第一阶段见到的那些越南籍家具工人喜爱玩的“台湾牌”。阿山因为喜欢学习中文,便在业余时间自己待在房间里练习中文,另外,笔者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也被阿东邀请下象棋,在笔者输给阿东几局后,旁观的文叔替换笔者与阿东下起象棋来,表现出了管理人员与越南籍家具工人

之间和谐相处的特点。

个案 10: 2013 年 1 月 21 日晚, 笔者饭后随阿东上了楼, 阿东笑着端来一盘中国象棋。阿东把棋盘放到三个堆着的席梦思垫子上, 盘腿坐上去, 说: “相机, 相机。”这时阿山从房间里出来, 对笔者微笑着用中文说: “中国象棋。”笔者也跟着说: “象棋, 象棋。”阿东的象棋下得很厉害, 每次十几步就将死了笔者, 笔者称赞阿东, 阿东很开心。之后作为管理人员的文叔上楼, 看到说: “你老输他啊, 我来。”文叔便和阿东下起来, 结果文叔马上要将死阿东却又下成了和棋, 之后将双手合适放于左耳侧和阿东说: “最后一局, 下完睡觉了。”阿东点头表示同意。结果还是和棋, 阿东也高兴地收拾起来。笔者随文叔走到楼下说: “明明两步就将死他为什么要退回来和棋?”文叔说: “阿东小心眼, 你要是赢他, 他就非要和你下, 下赢了为止, 我也不能输他, 就‘和气’吗。”

值得提及的是, 业余生活虽然丰富, 但反映了明显的由小团体内部同质性的强关系和小团体之间异质性的弱关系导致的工厂内部社会网络分化, 小团体都是在一起做业余活动的。阿东、阿山最喜欢在业余时间学习中文、玩扑克、喝茶、下象棋, 而阿力和阿树来自越南沿海城市海防的渔村, 除上述活动项目以外, 也喜欢看电影和听流行歌曲, 他们因为会打鱼捕虾, 所以有特别的业余休闲方式, 就是去东部的鱼塘里抓“塘角鱼”, 体表光滑有黏液, 寄生在鱼塘角落泥里, 这种鱼肉质鲜嫩, 但是表面光滑, 去鳞和去内脏的时候文叔经常会割到手, 但由于老板称赞过塘角鱼好吃, 加之这是免费的“午餐”, 所以阿力和阿树经常在午休的时候去爪塘角鱼, 这也成为阿力作为师傅出面进行与自己的小团体以外的人交际的“礼物”。

个案 11: 2013 年 1 月 21 日午休时, 窗外传来了笑声, 远处虾塘的土坝子上走来两个人, 各把着扁担的一头, 扁担穿过桶的把手, 桶挂在扁担的中间, 便是阿力和阿树捕鱼回来了, 进入工厂院子后, 阿力笑着大声说了一通话, 大家看到都笑了, 阿力很开心, 笔者数了一下, 捕了 12 条塘角鱼, 鱼个头还挺大, 还捕了虾。阿力指着阿宁说: “阿宁, 老婆, 老婆, OK, OK。”阿宁连忙摇头说: “我不带了, 感恩(音译越南语‘谢谢’), 我不带了。我不会杀鱼, 我们不怎么吃鱼的。”

(二) 物品共享的效率

与上文叙述的业余生活用品的分化不同, 由于这些消费品是共享的, 越南籍家具工人便会凑在一起, 聊天、开玩笑等新的建构社会架构的行为, 在这一建构过程中, 物品的共享也成为越南籍家具工人关系的“晴雨表”, 物品共享的效率, 即可以用共享的

速度与共享者的情绪来判断。

个案 12: 阿山来到工厂的时候带着北宁老家的水烟筒, 大多时候自己用, 也会和其他人分享, 另一个小团体的师傅阿力便经常借用阿山的水烟筒, 平常阿山用过后便斜着竖在一个小铁桶里, 烟筒里的废水、烟灰以及喝过的茶叶也会倒在桶内, 谁都可以用, 但是在两人的一次分歧之后, 阿山带走了水烟筒独自使用, 阿力只能自己制作一个水烟筒。

另外, 工厂提供的其他宿舍娱乐设施的共享, 大多数成为巩固小团体内部凝聚力的工具。例如阿东下象棋的时候阿山会在一旁观看, 而电视、DVD 播放机也常常由阿力和阿树占用, 播放劲爆的迪斯科乐曲, 阿力和阿树也跟着跳起了舞。

需要补充的是, 在物品的共享网络里也存在着消费的共享, 阿山在其他 3 人的指引下, 坐老板的车到市内买了一个触屏手机作为过年回国送女儿的礼物, 经笔者观察, 与三星的 GT-I9300 手机相似, 不过是山寨手机, 手机系统经常从越南语变成泰国语, 售价也只有 360 元。但是由于是在其他越南籍家具工人熟悉的店购买的, 而且相信其他的工人, 所以坚信这个手机是真品。而且大家时不时会拿出自己的手机讨论, 所以通过相同的消费地点、相似的消费档次以及同胞之间的信任, 这种消费反而生产出了共同的消费群体, 以在群体内部交流信息和相互支持。

(三) 等级惯习的延续

C 市这家家具厂的师徒等级制与在越南的家具工厂相同。该家具厂的越南籍家具工人内部分为师傅、小工、学徒三个层级, 也有之前不是家具工人的, 有的是建筑工、农民以及其他工种, 经朋友介绍到家具厂里做学徒——比小工还低一级别的工人, 但因技术较易掌握很快会成为小工, 并且因有师徒关系, 会在师傅的教导下超过小工, 比小工要高一级别, 有些小工拜师后也会成为学徒, 不过因需要雕工和木工的“细活”, 并会设计图样, 要成为师傅就有些难了。工人内部等级最明的体现在洗碗、喝酒种类、荤菜上, 师傅从不洗碗, 小工和学徒吃饭一桌, 师傅一桌, 师傅可喝啤酒, 吃更多的鱼, 徒弟、小工喝桶装米酒、荤菜较少。

另外, 从饭桌上的座次也能看出, 中国工人阿宁坐在管理人员文叔对面, 两名越南籍师傅其中一名坐在文叔的旁边, 另一名坐在阿宁的旁边, 之后向外座次是小工和学徒。阿宁得以坐在管理人员和师傅中间, 根据之后持续的观察, 推断其一因为阿宁是中国人, 隐隐的族群意识使越南籍师傅让出位子, 保持中越二元的分布; 其二因为酒都习惯性放在阿宁的旁边, 阿宁是中国籍小工, 由阿宁负责填酒, 这样也给越南籍师傅们面子。并且, 啤酒由于师傅才能喝,

加之价格高于米酒、口味也更符合师傅的喜好,在这家工厂的场域里具有象征“师傅”地位的作用,笔者替文叔以“局外人”的身份替文叔奖励其中一位师傅一罐啤酒,以对其工作进行表扬。

个案 13:在工厂的第一顿晚饭,与管理人员和家具工人一起吃饱又喝足以后,时间已接近 9 点,是该睡觉的时间了,大家嘻嘻哈哈地站起来回房间,笔者拿起自己的碗想收拾碗筷,作为管理人员的文叔拦下说:“你别动,让阿树来,他是小工,小工洗碗,你别管了。”这时阿树已经开始收拾起碗筷,之后端到水龙头那里洗了起来。

家具厂老板 2013 年 1 月中旬交给阿东一个雕工的活,作为师父的阿东非常认真,不怎么休息,而另一位师傅阿力却显得经常休息和漫不经心,所以文叔对笔者小声嘱咐了意图,笔者见没人注意便立刻把啤酒放到阿东的碟子旁,说:“翁鳖(音译越南语喝啤酒)。”然后拍拍自己的肚子装样子打了个嗝,说:“喝不了了,你帮我。”这时阿东的表情很奇怪,没用手接,却突然把头低下,然后瞪大了眼睛,非常严肃甚至有些恐惧,笔者接着起身跟各位工人碰杯,阿东还是喝着米酒,那罐啤酒还放在原来的位置,但是阿力和阿树的眼神还是不由自主地看了一下那罐啤酒,阿山没有看,专心地喝着自己的汽水。之后阿东都没有说话,只是夹菜的时候偶尔抬头,直到喝完这杯米酒,阿东才喝起那罐啤酒来。当喝第一口啤酒的时候,阿东还是用那双大眼睛很快速地看了一下阿力和阿树,看到阿力和阿树在聊天,这才放心地喝起来。

(四)内卷化的小社会网络

越南籍家具工人在工厂内相对封闭,单调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文化场域、社会资本的匮乏,使得 C 市越南籍家具工人的社会网络边界基本与厂区一致,所以因来源地不同或者引荐到中国工作的亲疏远近关系而在工厂内部分化成小社会网络单元,且这些小的社会网络之间的边界比较清晰。越南籍家具工人之间表面和气,但对于工作量界定不清的劳动收入非常敏感,容易产生分歧,坚持本人从属的小社会网络的整体利益。

个案 14:阿宁,广西梧州人,汉族,35 岁,来工厂学习木工手艺,木工小工。笔者与他聊天时问到:“他们(越南籍家具工人)会有一起和你产生矛盾的时候吗?”阿宁回答:“我这个人很光明磊落的,他们背后肯定有说闲话的,他们自己都不和气,还有私下向管理人员打‘小报告’的。有时候也跟我抱怨,我和文叔说,文叔叫我就当没看见,我确实没必要夹进去,一起做工和气就好,他们平时对我也蛮和气的,有时候也会和我表示对别的越南人的不满情绪。我

也就和和气气就好”。

笔者在观察越南籍家具工人所住的房间时,发现工厂按照越南籍家具工人的亲疏远近安排住宿,中国工人阿宁单独一间,2012 年第一阶段调查所见一位越南籍妇女住在一楼,其他都是按照工人的亲疏远近各自住在一起。经观察,越南籍家具工人每个房间的床位都是延对角线对着的,一张床放在一个墙角,周边摆设简单,但是从摆放的鞋子位置可以看到,一个人至少有一冬鞋和一双拖鞋,以床为中心点,大约到各自的鞋为半径画出范围来看,一个房间基本上是平分成几块的,并不如想象中师傅会占有更多的“地盘”,由此看出,对于小社会网络内部的支持行为,出于亲戚、好友等亲缘关系,也是保持互相谦让以维护稳定。而这种稳定背后的作用力,便出自工厂内部内卷化的社会网络,在工厂内部,越南籍家具工人接受的和给予社会支持的“意向”,便是这样有限而越发稳固。

五、社会支持网络的效果分析

上文中通过空间性分析对围绕 C 市越南籍家具工人的社会支持网络中发生支持行为的空间点进行展现,并且通过时间性分析对 C 市越南籍家具工人的跨国及家具工厂内部的社会支持网络塑造直至内卷化进行了剖析,叙事出一张从越南国内到中国 C 市的社会支持网络。那么,在这样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于 C 市越南籍家具工人产生的效果又是怎样?下文将以 C 市越南籍家具工人所“依附”家具厂的运作表现作为对社会支持网络效果的反馈进行分析。

(一)工资的支付途径

基于上述空间性的作用,工厂的老板支付工资一般不直接发给越南籍家具工人本人,而由老板在越南的朋友或者社会其他关系网络支付到越南籍家具工人的家乡,每个月的中旬以越南盾的方式汇给他们家乡的亲人,熟悉的甚至直接送给其亲人。之后,代替老板在越南支付工资的人回到中国后,家具厂老板以当时人民币兑越南盾的数额进行偿还;工厂负责包下越南工人的烟、酒、食宿以及应急费用,工资和工厂包办以外的费用会从越南方面支付的工资中按照当时人民币和越南盾兑换的钱数进行扣除。

个案 15:据阿力反映,工钱(越南)海防(市)那边老板的朋友用越南盾送到他们家里,这里不发工钱的,每个月的中旬那边发工资,越南人的家里就收到钱了,老板信用很好,所以他们手里也没什么钱。

对于这种支付方式,越南籍家具工人表示很认同,从越南籍家具工人自身的原因来说,因跨国流动

的载体都是北仑河上铁皮船摆渡,不通过中越两国的海关进入越南,而越南的警察又在越南一侧河岸上等待并围堵搜查,发现越南人身上要是有现金尤其是人民币就命令上交,越南警察收缴了钱之后却放进自己的口袋,也引起越南籍跨国人员的厌恶,这样一来越南籍在中国做工的人员都不愿意随身带钱。从中国雇主自身利益和保持生产力持续性的角度来看,通过这种方式,中国雇主通过自身的跨国社会网络完成了工钱的支付,既得到越南籍家具工人和其家人的认可,又避免了越南籍家具工人利用手中现金与工厂以外的社会中消费、银行等部门的直接联系或出门走动的麻烦。从越南籍家具工人迁入地本地及周边村落当地人的交流来看,越南籍家具工人与外界并不相识,甚至不知道远处交通情况。也就是说,这种方式极大地减少了越南籍家具工人对外交流从而扩大和积累社会资本的能力,从而保持了工厂现有运行状态的稳定。

从这里可以发现,对于C市越南籍家具工人社会支持网络,当跨国的“大社会网络”笼罩越南籍家具工人在C市的“小社会网络”的时候,从空间上看,越南籍家具工人获得的社会支持在越南籍家具工人生活、工作的场域之外;并在时间性产生的效果中,越南籍家具工人所获社会支持呈现出相同支持方式频率上的积累,从而取代了以个体为中心自然而然地向外界进行扩散式的积累,从而使C市越南籍家具工人的“小社会网络”产生内卷化效应。

(二)矛盾的应对方式

对于上文中描述越南籍家具工人维护自身小社会网络利益,有打“小报告”的行为,家具厂的老板和管理人员都只采取忽略的态度。这并不是表明中国雇主和管理人员不关心工人之间的关系,结合前文中对越南籍家具工人工作机会获得的空间性描述,可以推测:其一,因为亲缘的关联性太强,其“小社会网络”对于中国C市越南籍家具工厂来说是不可能打破的,这种“人情”也使得越南籍家具工人不能成为单纯出卖劳动力赚取收入的非社会性的职业个体;其二,由于工厂包吃包住,并尊重越南籍家具工人的工作间歇习惯和饮食习惯,所以在越南籍家具工人生活的其他方面并没有不适感,“小社会网络”的边界导致的矛盾并不会高度激化,这样保证了对于家具工厂最重要的生产稳定性;其三,由于越南籍家具工人本身就属于散工性质的自由劳动群体,^[17]且因跨国亲缘网络导致容易招募越南籍家具工人,导致经常更换工人,使家具厂管理人员没有意向下工夫逐步解决小小的利益纷争。

个案16:在谈及如何处理和解决越南籍家具工人利益争执的时候,文叔说:“不管,不影响生产就

行,你像阿宁有时候也和我说,上面吵起来了过后互相都不讲话了,我就说不管,和我们没关系,好好干活就行。上次把越南工人都辞了就留下阿东,阿东还说他能找到更好的工人,之前有个你4月份来的时候问的另一个阿山(阮文山),他也被辞了,他是越南合伙人的亲戚,工人都是他找的,找来那么多很多不行的。阿东也想这么干,说他找越南工人,然后他做老大,我说你要做老大,自己开个厂去,我这里没有老大,只有干活的。阿东这人干活还是很认真的,就是心胸比较小。他们吵归吵,吵了对我们有好处啊,没有老大了,后来为了避免,我们每月给他们的工资师傅和师傅是一样的,小工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年底分红不一样,干得好的多给一些,干得不好的给个几百块完事,不好还不想让你来呢。”

工厂对越南籍家具工人内部矛盾的应对方式,也起到了稳定了越南籍家具工人内部的社会网络框架的作用,使越南籍家具工人逐步适应并接受不变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令其除了工厂提供的有限的休闲娱乐之外,只能在占生活更大分量的工作中寻找个体的存在感,即对于C市越南籍家具工人来说,工作基本成为社会网络中实现自我角色以及得以继续安全留在这个网络里的唯一途径。

(三)无法忽略的女性身影

在第一阶段的调查中,笔者所见一位负责做饭和卫生的越南籍女性工人,因为两次将电饭锅放在水槽里刷洗,使工厂更换了三台电饭锅,对此事件进行访谈时笔者得知,这位越南妇女的工资低于小工,仅仅比在越南的时候挣得多一点儿,且其要求提高工资却没有得到回应,所以破坏工作的用具——电饭锅,破坏的结果便是离开已经固定的工厂内部社会网络,即三个月后她被辞退了。

个案17:在与管理人员文叔的交谈中,笔者了解到,文叔针对这位越南妇女三次用坏电饭锅的行为表示:“她肯定在越南没用过电饭锅,越南家里的锅就是放在水槽里刷的吗。她跟我说电饭锅坏了我还以为质量不好,拿去修人家说被水泡了,电路坏了,我还纳闷,又买一个还是这个结果,第三次先是被我发现原来她把电饭锅整个放在水里刷,我火了说了她一顿,后来电饭锅还是坏了。直接开除她,反正她也干不了什么活。”

当我们把视线移向这位工厂里唯一的女性时,便可发现,这一容易在男权主导的工厂内被忽略和藐视的研究对象,其破坏行为从相反的方面体现了“破坏工作”而实现自我的特点,进一步讲便是其突破“内卷化”社会网络的意向。

通过对文叔的访谈可以明显判断这位越南妇女在工厂内部的地位很低,但遗憾的是笔者未曾获得

访谈这位越南妇女的机会,但是这种在工厂内部“离经叛道”的行为,可令人反思,在与男性越南籍家具工人相同的社会支持网络中,其女性身份在工厂内部是怎样被塑造出的?首先,在时间性上,由于工厂内部与越南非常相似,所以对于这位越南妇女来说,“未来意味着对过去的一种复制”。也许这与其他男性越南籍家具工人一样,共同经历着其社会网络的内卷化效应,但因为其地位更低,所以这种内卷化的效应便更大程度降低这位越南妇女在工厂内的地位,令其越来越被忽视,且当其工资与在越南相差不大时,其对工厂和这份工作的认可便会大大降低,从而产生对C市越南籍家具工人的社会支持网络第二个效用——“通过工作实现自我”产生了反向的行为。而且,就算这种反向的行为发生自男性工人,得到的也是相同的下场——被辞退。

个案18:对于工厂的薪资和管理,越南籍家具工人也表达了自身对权益的诉求,如阿力作为师傅,其工资以及在工厂里得到的尊重不能超越另一位师傅阿东,向管理人员文叔的抱怨也没有正面的回应,便通过加大工厂器械的耗损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结果,老板几次发现之后,笔者与2013年10月的调查中得知,老板以木工师傅阿力经常跟他借钱出去嫖娼,担心其被发现为由,将其辞退。

对这位看似“边缘”的越南妇女以及因令机器高耗损而被辞退的木工师傅的分析便可发现C市越南籍家具工人社会支持网络之强化男性主导的支持方式。相反的说,对于相关劳动生产力不足的女性或者“边缘化”“女性化”的工人进行苛刻的支持。

(四)对于偷盗的漠视

管理人员文叔的旧手机以及200元钱于2012年10月底在工厂内他的办公室里丢失,而同样住在厂里的其他人没有丢失东西,办公室其他财务也没有丢失,所以这一事件的指向性很明显,是针对文叔的。不过,由于损失钱物总价不高,文叔并没有深究和调查。相比常人丢失手机和200元钱的抱怨和愤怒,文叔的轻描淡写也反映出其对既定的社会网络的服从,最根本的,相比保持家具厂的稳定运转,一部旧手机和200元确实算不了什么。

个案19:对于这一事件,文叔表示:“算啦,我这部手机连彩屏都不是,我用手机能打电话就行,丢了就丢了。我记得200元钱对折压在手机下面,当时就放在办公桌上,我那个写生产计划的本子旁边。一般也不会有谁进来拿的,这几天你(笔者)的电脑和手机都放在那里,也没丢啊。奇怪了,算了,也没多少钱的东西。”

通过上文所述,可发现其在文化的相容性下,劳资双方基本保持和谐的雇佣关系,C市越南籍家具

工人所得到的如与越南相同的消费品、工资支付、管理层对其适度的宽容,以及文叔“自认倒霉”表现出管理人员权威的降低,加之不同工人团体间的矛盾和由于越南籍家具工人的散工性质而导致工人数目减少。这些都令人联想起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awoy)笔下的吉尔公司。^[18]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吉尔公司不同,作为家具工厂,由于其产品的工艺性以及手工艺方面对工人技能的要求,在现有的等级制度下,其工资数额并非计件而来,而是固定支付的钱数。所以,每一件家具产品的生产,都是指定人头进行固定的技术工作,这样一来,工厂的生产便于管理。但是,文叔对偷盗行为的漠视反衬出其他绝大部分越南籍家具工人对现有工作、生活境遇的认同。这种认同也体现出越南籍家具工人对现有的社会支持网络的接受和内化。

六、结果与讨论

社会网络的经典理论包括关系强度理论、嵌入性理论、结构洞理论、社会资源理论、结构角色等理论。而通过本研究,在文化视角下,基于当下现实情况的叙事对C市越南籍家具工人为例的中越边境越南籍散工社会支持网络进行解构,基于参与式观察所发现的实际情况,由这一社会支持网络提出新的思考。

C市越南籍家具工人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是由跨国社会网络、工厂与越南籍家具工人互动的实践行为所构成的,这与众多关于中越边境的研究成果并不相左。但值得注意的是,对当下具有历史渊源和惯习延续的社会表象进行研究,应该发掘和联系其在全球化时代的新表现。作为对当代社会现象的研究,应尽量以当代的特征在当代的功能来进行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和定位,使其成为与其他特征相联系的当代环境的一部分。^[19]那么,基于上述社会支持网络,从C市越南籍家具工人自身来看,其身体与所处环境之间建立起了一个生产关系;从C市越南籍家具工人与其附身的社会支持网络的互动来看,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体现出了“情感的表达和体验”。那么,中国C市的越南籍家具工人作为代表中越边境越南籍散工的群体“人格”,虽然其属于一个社会性的行动者,但本文并非简单描绘一幅其行动的图示;对于其附身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虽然从空间和时间概念的框架入手,但本文并非画出C市越南籍家具工人或者引申为中越边境越南籍散工的辅助图示。而是通过对具有跨国性质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结合C市越南籍家具工人所具有的“越南人”和“散工”两种属性综合的性质进行整体视

角下的观察和分析。

本文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中越边境地区的跨国劳务流动群体,C市越南籍散工既属于越南主体民族的京族,又属于区域国际劳务分工的行动者,围绕这一群体的研究是基于现代国家民族和国际分工的语境中的。这样一来,作为这一群体生存的中国C市也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就单一的城市范围和现状来说,C市也成为跨国民族共生的空间。值得思考的是,这种共生的空间的格局是变化的,从古代此地两国边民共同生活在“天下”概念的边疆地带,到现代国家边界精确划分之后中国一侧按照国家意志进行重新规划的城市。这一变迁使得如上文所述家具厂迁到市郊农村中,随之,越南籍家具工人也生存在了城市的边缘。如众多越南跨国流动人员一样,从古代与如C市地带的边民相融,到今天成为C市的边缘群体,越南籍散工体现出的神秘性和松散性,以及被塑造为“边缘群体”,这一变化伴随中国的现代国家边境城市的区域重构而形成。所以,作为越南籍散工跨国流动的原动力是中越两国长久以来相互流动的惯习,当今越南籍散工跨国流动的社会现象便是现代国家意义上文化流动的体现。那么,在这种意义上说,中越边境越南籍散工的形成如果起因于“空间的劳动分工”的话,那么中越边境和谐边疆的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中国从黄土国家经过东南亚各国到成为真正走向文化南海的蓝海国家,应该培养边境城市与周边国家文化相融、开放的能力。

温故历史,如中国C市这样的边境城市与接壤的越南城市同样,都可以作为历史上相似甚至共同的文化质点;放眼当下,正如《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关注“跨国个人关系网络”“迁徙政策”的发展现状,尤其是在“新时代下的治理与合作关系”中,提出南方国家的崛起使国际合作体系将更加多元化,形成更加全面的双边、区域乃至全球合作网络。那么,在全球化时代下的东南亚区域合作中,关注如中国和越南之间边境的文化流动才能根本上发掘出区域合作、和谐共生的潜质。

致谢:本文在田野调查与写作过程中获得了广西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秦红增教授的指导,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 [1]张继焦. 城市的适应——迁移者的就业与创业[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2]郭伟和. “身份之争”:转型中的北京社区生活模式和生计策略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3]李强. 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J]. 天津社会科学,1998,(1).
- [4]张友琴. 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城乡比较研究——厦门市个案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01,(4).
- [5]唐钧,朱耀根,任振兴. 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网络——上海市个案研究[J]. 社会学研究,1999,(5).
- [6]赵景欣,申继亮,刘霞. 留守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其自尊、交往主动性之间的关系——基于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视角[J]. 心理科学,2008,(4).
- [7]车文辉. 城镇失业性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络重构[J]. 求索,2004,(9).
- [8]景天魁. 中国社会学年鉴 1999—2002[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9]王春光, Jean Philippe BEJA. 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J]. 中国社会科学,1999,(6).
- [10]吴晓萍,何彪. 美国苗族移民的社会网络关系[J]. 贵州民族研究,2003,(4).
- [11]何亚平,骆克任. 上海跨国迁移与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以在沪日本人和赴日返沪人员为例[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 [12]李志刚,薛德升, Michael Lyons, Alison Brown. 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J]. 地理学报,2008,(2).
- [13]孙晓娥,边燕杰. 留美科学家的国内参与及其社会网络强弱关系假设的再探讨[J]. 社会,2011,(2).
- [14]韩冬临,崔大伟. 国际移民的跨国联系——基于留日海归的实证研究[J]. 国际观察,2011,(5).
- [15]李树茁,杜海峰,杨绪松,靳小怡, [美]费尔德曼. 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16]刘世定,邱泽奇. 内卷化概念辨析[J]. 社会学研究,2004,(5).
- [17]秦红增,陈劲波,韦艳丹. 文化相融与合作共享——基于中国广西D市越南籍散工的讨论[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 [18][美]迈克尔·布若威.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19][美]赖特·米尔斯,陈强,张永强译. 社会学的想象力[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收稿日期 2013-04-18

[责任编辑 黄世杰]

[责任校对 苏兰清]

[作者简介] 陈劲波(1985~),辽宁大连人,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云南昆明,邮编:650091。郭帅旗(1990~),河南滑县人,广西民族大学2012级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邮编:530006。